



領導本來應歡迎大家來批評當前的教育制度、教學內容、教學方法等等方面存在的問題。殊不知，剛剛有學者提出一點比較尖銳的意見，有的領導就受不了啦，據說還要採取甚麼行動。這豈不是連魯穆公都不如了嗎？魯穆公聽了子思的話後，雖然不高興，但並沒有要採取甚麼行動，反而要成孫弋為他解惑。成孫弋的話說出了一個大問題。他認為，像子思這樣的「士」（知識份子）敢於對領導提出批評意見，正因為他們是不追求利祿和爵位（金錢與官職）的，而有些人可以為領導賣死命，但他們為的是得到利祿與爵位。回顧幾十年來，看看我們走過的歷史，眾多的失誤，難道不都是由於聽不進不同意見而造成的嗎？某些領導人不僅聽不進不同意見，反而給提出不同意見的人加上種種罪名，而進行迫害。這樣的歷史教訓還不認真記取，怎麼能領導好我們的國家？不喜歡聽批評意見的領導人，一定喜歡聽那些對他「歌功頌德」的「讚美詩」。可是這些「讚美詩」是一種

腐蝕劑，把那些本來就不怎麼樣的領導者弄得糊裏糊塗，忘乎所以，誤國誤民。對領導者多一點批評好，還是多一點「歌功頌德」好？領導者多聽一點批評意見好，還是只喜歡別人吹捧好？我想，還是多聽聽批評意見好。「恆稱其君之惡者」才是對國家與民族負責任的態度。今天我們的社會「歌德派」太多了，而像子思這樣的人太少了。甚麼時候多一點子思，而少一點「歌德派」呢？也許要等到黃河再變清的時候吧！

湯一介 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

## 君何國人？

趙敬衡

假定知識份子的主要社會職能是對體制進行文化批判，我就得首先回答一個問題：我面對的是甚麼體制。如果我承認中國的體制可能與西方不同，我就得先問自己一聲：君何國人？我們不可能是，也沒有必要做一個「世界知識份子」。對自己的立場的有限性是否自覺，是知識份子的真正標記。

記得一則公案：唐初多胡僧，某僧異相，人問「師何國人？」僧答「余何國人」。

仔細跟蹤閱讀近年的中國文化爭論，有時覺得我們不少人着了此西域僧的話語圈套。

道理實在是很簡單的，但是也不妨在此重複一下。假定我認為我自己是個知識份子，假定我也同意知識份子的主要社會職能是對體制進行文化批判，我就得首先回答一個問題：我面對的是甚麼體制。如果我承認中國的體制可能與西方不同，我就得先問自己一聲：君何國人？

當然我不是在問國籍綠卡、講學地點之類生活措置，我是問我的自我意識：我自視為一個中國知識份子，就必須首先面對中國的既成體制；自視為西方知識份子，就必須履行西方知識份子的職責。

沒有一種文化批判理論是普適的，連反普適理論，也不是讓人隨便搬用的。西方學院盛行的文化理論，是西方文化政治的有機部分，是西方社會內部話語權力制衡的需要。西方知識份子高舉「種族，階級，性別，民族」的旗幟，正義在焉，道義在焉，實際上這些都是文化批判的派生物，也就是說，要對照其體制語言，才明白底細。

這就是為甚麼以「追蹤西方學院前沿理論」，在中國很容易走入誤區；而被指責為「學理陳舊」的一些道理，很可能是中國當前文化批判之需。此中區別，當然需要仔細扒剔，不能統而攬之。但是有一點或許各位都能同意：我們不可能是，也沒有必要做一個「世界知識份子」。

當然我沒有狂妄到給所謂「海外新左派」，或國內努力放眼世界的學者們，講如此淺顯的道理。但是世界上大部分的學問，材料上可能很高深，分析可能極精微，基本的立場，卻還在我們自身。對自己的立場的有限性是否自覺，是知識份子的真正標記。如果我立意西方學界的話語權力，我就應當明白我批判西方體制的言論，並不是說給東方人聽的。我的理論立場，也難以照樣搬來研究中國問題。

同樣，西方的體制理論，例如新自由主義，例如社會民主主義，例如「第三條道路」論，在中國語境中，就不是體制理論，至少今天還不是。我不是說因此就可以或值得搬用，而是說，它們可以成為中國文化批判的養分。

或許這些朋友認為，他們面對的體制，是跨國資本，是全球化的體制，中國的特殊性是次要因素。因此他們可以做西方知識份子，同時做中國的知識份子，他們寫的同篇文章，可以同時為兩種文化批判服務，並行不悖。如果他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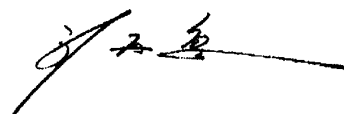
們對這種立場極為真誠，篤信不疑，他們的聲音當然值得傾聽。或許文化批判理論的非普適性，現在果真到了結束之時。對此，我盼望能讀到更有說服力的論證。

不過目前的情況，使我想起中國最偉大的留學生，唐初的玄奘。玄奘在印度學佛理，成績如此優異：在印度佛教的最高學術會議，曲女城的辯論大會上任論主，獲得「大乘天」至譽，回到長安後創立的法相唯識宗，是中國佛教史上最艱深，最「前沿」的宗派（佛教不久後就在印度開始式微），卻因搬用印度的種性論，而難以承傳。

這個故事未免太陳舊，道理也太淺。我只是想說，哪怕能自稱「何國人」的高僧，也不可能真正無家無國。

**趙毅衡** 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比較文學博士，現執教於倫敦大學東方與非洲學院。

## 可畏而不可信的學術年代



二十世紀中國的學術生態環境相當惡劣，尤其是二十世紀下半葉，激進政治更是帶給學術以致命的危害。但是，我們現在則不幸地看到，帶給學術生態環境以污染和破壞的，不僅來自激進的、缺乏人文眼光的權勢者，而且也來自心胸狹窄的知識份子本身病態的作風與心態。面對這種局面，我格外欣賞傑弗遜所說的一句話：「我從不因為宗教上、政治上、文化上的分歧而拋棄任何一位朋友。」

十年前，《二十一世紀》創刊之初，方正兄飛往芝加哥大學籌劃，其風塵僕僕之狀，至今印象猶新。當時歐梵、甘陽二兄和我皆是熱心人，毫無保留地支